

新科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

张玮玉

新科技的普及日新月异。一份数据¹显示，截至 2012 年 6 月，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到 24 亿，占全球人口的 34%。从 2000 年到 2012 年之间，互联网用户数目有了近 566% 的增长。北美洲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互联网普及率在 79% 左右。欧洲和大洋洲紧跟其后，达到 65% 上下的普及率。中东地区和拉丁美洲处于一个区间，普及率都略高于 40%。亚洲的互联网普及率较低，在 28% 左右。非洲最低，只有 16%。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的数据²显示，截至 2013 年全球移动电话户口量已高达 68 亿，几乎等同于人口数量，这个数目已经远远超过固定电话户口量（约 12 亿）。地区间的不平衡依然明显，非洲和亚洲分别列倒数第一、二位。同 2006 年相比，全球移动电话户口量增长了 309%。如此快速的普及在科技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类科技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普及速度太快而无法清晰地体现出来，为学者们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章将首先界定新科技和政治传播这两个主要概念，接着简略地回顾政治传播研究的历史，然后将焦点转向新科技研究的历史，并以互联网和政治传播为重点阐述新科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最终本章将提出一些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动向。

新科技的界定

所有科技都曾经是新的（Marvin, 1988）。印刷术结束了对口口相传的依赖，将信息固定化在纸质传媒上，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形态与习得方式。电台的出现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时代，很难想象现今的听众们还会被一出“火星人入侵”的广播剧所愚弄。电视机取代了饭桌和供桌，成为了客厅的中心，将来自家庭以外的各类信息带入人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即便是固定电话刚出现时，有关它改变人类社会的预言也是不绝于耳。时间过去了，我们看着这些曾经的新科技，发觉它们都曾被赋予极高的期望，似乎改天换地只是瞬息之间。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确被这些曾经的新科技改变了许多，但是教育、传播、人际关系等等根本议题似乎还是在困扰着人类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科技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词汇。似乎只有我们刚开始使用或即将使用的科技才可以被称为“新”，才有带来重大改变的可能性，而种种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的科技（例如水、电）却被忘却。本章对新科技的界定因此相对严谨，特指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涌现并普及的信息传播科技，以电脑、互联网、移动电讯、电子游戏等为主要代表**。这个界定首先排除了这个历史时期涌现的其他科技，比如说运输科技、医疗科技等。其次这个界定也排除了稍早开始（1950 年左右）的有线电视热潮，将有线电视归为电视技术的延伸，受制于电视产业的固有模式。再次这个界定不讨论那些曾经涌现但最终未完成大规模普及的信息传播科技，如 vcd 科技。最后这个定义不强调“新”的革命性隐义，只是撷取“相对年轻”这个含义面向。

¹请查看网站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² http://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statistics/2013/ITU_Key_2005-2013_ICT_data.xls

政治传播的界定

政治传播的定义众家纷纭，从宽泛到严谨不一而足。宽泛定义常常从字面出发，将政治传播描绘成“与政治相关的所有传播过程”。这个宽泛定义有两个关键词，政治和传播。我认为宽泛定义的主要困难来自于界定这两个核心概念。首先何谓政治？这个问题连政治学家都无法达成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就是一切与政府的产生、运行、更替相关的活动。另有一些学者觉得将政治局限于政府过于狭窄，应该将政治视为涉及人类自我组织的所有活动，政府只是人类自我组织的方式之一。举例来说，Negrine 和 Stanyer (2007)在他们的《政治传播导读》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定义，政治传播就是“社会主体之间就政治事务进行的一切传播”（p.1）。这个定义进一步将传播的行动者，即所谓社会主体，界定为“媒体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市民公众。”这个对于社会主体的分类基本受到了认可，其他各家的定义或多或少采用了这一三分法。遗憾的是关于政治事务的定义依然不够清晰。其次何谓传播？一个传统的分类是根据传播的范围将其分为人际传播、小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四类。但是这个分类仍然没有告诉我们传播这一行为或者现象的本质。McLeod, Kosicki, 和 McLeod (2009, p.228)提出政治传播着眼于“政治行动者、普罗公众以及新闻媒体间的讯息交换。”这个定义将传播解释为讯息交换，具有鲜明的认知心理学的色彩。McNair (2007)的定义强调传播必须是有目的性的，从而排除了无意识的讯息交换，体现了对传播主体的能动性的认可。由此看来，一个统一的、普适的定义可能是不存在也是无意义的。我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论界定必须在有关历史背景和学术环境下进行，一个字典式的定义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无甚帮助的。因此本章对于政治传播的界定不是从释义出发，而是从划定疆界出发，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新科技是如何进入这个版图并重新定义这个版图的。

任何版图都不可能是无限的。本章对于政治传播的追述起源于美国传统，随着叙述的演进逐渐融合英国、欧洲大陆以及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将美国传统作为源头并不是对于其他传统的轻视，而是根据一个基本事实，即政治传播这个学术领域在美国传统中最为发扬光大，甚至于政治传播这个学术词汇都是在美国传统中最为普及。比如说，英国传统习惯于将此类研究称为“媒介与政治研究，强调媒介体制、媒介文化、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政治意义。欧洲大陆传统往往从一个更抽象的哲学高度来讨论传播的政治意义（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很少将自己限定在传播这一学术领域。本章的下一部分将提供一个简略的历史回顾，间中讨论当时的所谓新科技是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传播研究的。”

政治传播研究的简略历史

政治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充分体现了传播学交叉领域学科的特质。即便是美国传统的政治传播学，也受到了多个学科的直接影响，包括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等（McLeod, Kosicki, 和 McLeod, 1994, p.125）。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可以追溯到美国传统起源时期的历史要求。二战期间的**宣传研究**常常被认为是激发传播学诞生的一个现实要求。如何使用传单、电影以及电台等传播技术来说服本国人民和军人支持战争，并影响敌国人民和军人，这些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定需要，从而为美国传统奠定了媒介效果的导向。如果宣传研究还持有对大众媒介效果不切实际的幻想（如电台广播可以左右听众的想法），随之而来的有

限效果时期可以看作是一种更正。有限效果的代表学派为哥伦比亚学派，他们的研究几乎完全落在政治传播的范围内，更具体来说，几乎完全落在**选举研究**的范围内。这个时期的美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是解开选民们如何决定投票的迷惑，一些经典理论如两步传播理论（two-step flow）因此产生。与选举研究一脉相承的是后来成为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媒介效果研究**，代表理论有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框架理论（framing）等，以研究媒介如何影响受众的态度与行为作为主要议题。这一时期被一些学者称为强效果的复活期，对媒介的效果在哪里怎样产生作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不得不说电视的普及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政治传播的走向，政治家们的影像声音得以进入每个家庭，从而改变了美国政治的规则，也改变了与政治相关的传播机制。

选举研究可以看作是美国传统的政治传播的一面大旗，而另一面旗帜就是所谓的**民意研究**。民意研究不仅仅对选举期间选民的态度行为感兴趣，还将非选举时期人民对许多政治议题的态度都列入研究范围内（Donsbach & Traugott, 2010）。民意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对调查方法的依赖，民意调查在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产业，甚至成为了一种非正式的政治体制。基于民意研究的这些特点，这个领域目前几乎已经独立于政治传播而自成一家，旨在描绘民意的分布、解释民意的产生、以及改进民意调查方法。民意研究的这一独立性可以在它拥有自己的学术协会这一点中看出来，美国民意研究协会以及世界民意研究协会都有自己固定的学术会议。即便如此，民意研究和媒介效果研究还是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两者都因为媒介作为影响民意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给与极大的关注，并共同使用一些基本理论如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

选举研究和民意研究都主要关注态度，当然选举研究也关注一个特定行为就是选民的选择。与这两者不同的是，**政治参与研究**认为政治行为远远多于投下选票这个动作，选举与选举之间的种种政治参与才使得政治体制得以维系。政治参与研究可以追溯到美国政治学家 Verba 以及同事们一系列关于政治参与及其不平等的著作（1978, 1995）。传播学者在 20 世纪后期开始关注政治参与，并企图将媒介效果传统带入这类研究，专注于各类传播活动（如新闻媒体的使用和日常政治讨论）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政治参与研究的崛起和美国 1960 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的现实显示投票不再是唯一的影响政治的方式。政治参与研究因此也特别具备政治社会学的色彩，关心人们是如何从社会化过程以及日常的社会活动中形成政治态度以及习惯的。著名的社会资本学者 Putnam（1995）就曾将美国人社群参与的减少归罪于电视，认为电视将人们留在家中，占据了他们原本和邻居们交往的时间。

与美国传统几乎同时发展的是英国以及欧洲大陆传统，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研究都和这个传统紧密相关。两个传统的最早交集以欧洲传统的批判学派对于美国实证传统的批判呈现。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强调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关注政治系统（包括媒介系统）、社会群体多于个人。批判常常建立在一些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对媒介与政治的反思多强调这些已有体制的压迫性。考虑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倾向，不难理解这种批判现有体制的路数。这个开始于选举研究时期的对峙，笔者认为长远来看对传播学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批判传统与实证传统的相互排斥，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除了相互不屑以外，两个传统各行其道。甚至于在某些中文传播学的书籍里，实证传统被不公正地贬低，批判传统又过分被拔高。可喜的是，随着传播学的国际化，对峙的状况正在改善。当不同于英美以及欧洲的政治系统成为我们的研究情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既需要高屋建瓴的批判与反思，也需要细节严谨的求证与描绘，从

而完成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过程。笔者认为，比较政治学及其下属的比较媒介学较好的进行了这样的融合。以 Voltmer (2006) 为代表的比较政治传播学者，在厘清政治以及媒介系统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个体受众对媒介内容的反应。实证研究的方法可以使用，但是其中的一些对于系统的假设必须首先得到修改，相对应的测量工具等也要得到修改。基于这样的学术发展现实，有关新科技和政治传播的研究从早期就呈现了一种批判学派和实证学派并驾齐驱的势头，本章的下一部分将详细描绘这相对短暂的历史发展与研究现状。

新科技研究的历史

以电脑、互联网、移动电话为代表的这一轮新科技，其历史不过半个世纪，但它们的普及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却是以前的科技无法比拟的。电脑最先是以前处理大型数据的工具出现的，上世纪 60 年代左右，电脑开始向传播科技发展。根据 Rogers 和 Malhotra 的历史回顾 (2000)，一些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眼光的先驱们，首先看到了电脑作为传播媒介的巨大可能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这些新科技的发展方向。这些被提名的先驱们多为美国大学教授或者大型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们对于电脑以及电脑网络的设想因此也常常较理想化。基于这个历史条件，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新科技的学术研究常常受到了这些先驱们以及他们的思想的影响。很多早期关于这轮新科技的著作充满了预测的意味，如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些预测也往往倾向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这些新科技将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的一些问题。随着新科技的普及，更多的学者与研究机构加入进来，开始了 Wellman (2011) 所指的描绘期，即系统地描述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些新科技的。一些长期性的研究项目，如 Pew 互联网研究中心、世界互联网研究项目等都以定期发布对用户及其行为的报告为任务，在国内相对应的就是中国互联网研究中心定期发布的报告。当新科技几乎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词，有关研究开始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分析期。学者们不再满足于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如调查问卷）描绘这些新科技的使用，而是企图综合不同学科的强项来分析新科技的影响。这一时期中，互联网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开始兴起，来自于社会科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等领域的学者们聚集起来，一些专门研究互联网的机构诞生了。与此同时，互联网研究在一些传统学科逐渐取得了合法性，传播学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多领域学科，对新科技的容纳是最为迅速的。同样的趋势最近可以在移动电讯研究中看到，移动科技的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综合研究领域正在形成中，国际传播学年会在过去的五年中几乎年年都会举办专门关于移动科技的前会。

尽管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常常被看作是电脑以及互联网的诞生地，商业力量和官方力量在这轮新科技的发展中也非常重要。商业力量的加入不但推动了新科技的普及，而且改变了理想化的先驱们为新科技设想的未来。一些重大的新科技公司如微软、诺基亚，不但是技术创新的先锋，也是新科技研究的重要力量。微软研究中心在招募技术型研究人才之外，也招募社会科学的学者作为团队的一分子。诺基亚研究中心一度聚集人类学者从事移动电话在用户每日生活中的使用的研究。不过这些商业研究从根本上是为了商业利益服务的，因此议题与范围都受到了限制。官方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先驱们设想的未来，种种政策制度减弱了这些新科技的乌托邦色彩，并逐渐将它们纳入已有的管制范围内。理解了这些历史发展之后，我们就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新科技对政

治传播的影响会长期纠结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争论之中。下面笔者将以互联网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为主要关注点来描述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

互联网与政治

互联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分成两个面向，一个是“有关互联网的政治”，另一个是“互联网上的政治”。前者是围绕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政治，先驱们曾经想把互联网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虚拟天下，但是种种商业、官方、政治力量都不断地改写这个理想。这一面向可以和欧洲传统的媒介政治经济学相类比，关注的是互联网如何受到各类权力的影响。后者是将互联网看作一种媒介、一个平台、或者一类空间，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在这个新舞台上上演，不可避免会呈现一些以往未见的新形态和新意义。这一面向关注于传统的政治主体们，包括政府、政治家、政党、利益团体、活跃分子以及普通民众是如何使用互联网的。除了信息交换之外，意见的形成与表达、情绪的分享、有政治意义的行为等等，都在互联网这个场域中发生。

有关互联网的政治通常发生在网下，互联网行业的结构、政府的政策法规都是互联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全球瞩目的 Snowden 事件充分体现了政府监管与网民隐私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不仅仅是某国内部的冲突，而且由于美国在国际上大力推行互联网自由，中俄等国强调互联网监管，而演变成地缘政治的一部分。谷歌在 2010 年高调退出中国市场就是这种互联网地缘政治的一个范例。与现实相对应的，有关互联网政治的研究也高度关注两个议题：一是政府如何实施管制，二是政府**应该**如何管制。前者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后者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关于各国互联网监管政策、策略以及行为的研究有时被简化为“互联网审查”研究，常常与“互联网自由”这个概念对立。比如说，开放网络计划（OpenNet Initiative）出版了一系列三本的书藉来记录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审查活动，第一本《access denied》关注于网络过滤，第二本《access controlled》关注于各国政府如何积极使用新科技进行控制，第三本《access contested》特别关注亚洲国家及其政府的网络控制活动。这些以描绘为主要任务的研究其实不乏规范性的倾向，多数学者都认为有关互联网的管制和政策应该听取多方意见，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运用“互联网自由”作为主导概念的研究也很多，比如说，MacKinnon（2012）的《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global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旗帜鲜明地要求商业力量和官方力量在建构互联网的时候需要获得用户的首肯。互联网审查与互联网自由之间的话语之争可以追溯到互联网历史早期的乌托邦理想，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理想，虽然受到了各类权力的改写，仍然是相当一部分的用户对互联网的期待。中国情境下的相应研究也不乏存在，从审查到反审查都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如 Qiu, 2007; Tsui, 2001; Yang, 2010），遗憾的是商业力量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在中国互联网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尚未得到系统地考察。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此类新媒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

互联网上的政治顾名思义主要在网络上进行。由于互联网发展早期的乌托邦色彩，一类研究专门论述互联网的民主化可能性，一些学者称之为“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或者“e-民主”（e-democracy）研究。这类研究体现了欧洲传统的重大影响，常常从宏大概念如“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等出发来考察新科技能否推动何

种民主模型的实现。有多位学者都曾思考过各类民主模型在互联网政治研究中的体现（如 Dahlberg, 2011; van Dijk, 2000），并一再号召大家在思考数字民主这一问题时分清不同的民主模式及其背后的规范性假设，因此才能对互联网的民主潜能这一问题做出全面的回答。Dahlberg 的近作（2011）将数字民主研究分为 4 个传统，分别为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individualist)、商议性(deliberative)、反对公众(counter-public)、以及自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t)。自由个人主义的民主模型着眼于新科技提供给个人的自由争取利益的机会，此类模型为多数互联网政治研究所遵循。商议民主模型受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启发，强调互联网如何促进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间的商议，这个模型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在使用。反对公众模型并不强调理性的讨论，而是关注互联网如何帮助某些边缘化的政治群体的形成以及斗争。自治马克思主义模型则将互联网看作是一个激进的工具，可以超越国家与资本主义的桎梏而达到自我组织和共同参与。与此相类似的，Coleman 和 Blumler（2009）在运用“数字公民”这一概念的时候，也根据不同的政治哲学传统做出了详细的分类，并探讨互联网如何与不同的数字公民模式产生联系。这些研究表明有关互联网能否推动民主化的争议（如 Hinderman, 2009）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民主模型之间的争议。比如说，有的研究发现信息的极大丰富加强了个人争取权益的能力，有的研究发现公民之间的网上讨论并非那么理性，前者可能就此推论互联网是有利于民主化的，而后者却声称互联网不利于民主化。民主模型的讨论提醒我们互联网或许有利于自由民主，而并不能自发的为商议民主服务。数字民主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也许研究中国互联网的学者们可以试着提出适用于中国互联网的分类，看看互联网在中国环境下到底促进了哪些政治理想的实现，又是怎样阻碍了另外一些理想的实现。

本章对关于“互联网上的政治”的研究将以政治主体来分类，回归政治传播的传统界定。如上所述，政治主体可以分为政府、政党、政治家、民间组织、新闻媒体、政治积极分子、普罗公众等等。这些政治主体是如何运用互联网来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这个问题将成为笔者组织研究成果的主线。先从政府开始，各国政府都企图利用新科技来加强管制的效率和合法性，“电子政府”(e-government)、“电子管制”(e-governance)、“电子咨询”(e-consultation)等名词曾出不穷。很多研究项目都直接受到政府资金的赞助，建立一些电子平台并考察它们对公民的影响。研究表明(Reddick, 2010)，互联网有利于政府部门公开一些法律政务信息，使得公民们查找这类信息的需求得到很大满足；另外也有利于政府部门将一些公共服务电子化，大大减少公民办理此类事务的时间，提高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与此同时，互联网也给政府管制带来很多挑战，尤其当灾难事件等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快速常常挑战政府部门的应对速度和策略，或者一些公民不满公共服务的一些漏洞而公开批评政府部门，这些部门也必须提高危机处理的能力。研究人员发现(OECD, 2003)，尽管互联网在信息公开和电子服务方面贡献很大，多数政府在运用新科技来整合公民参与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困难。有一类考察政府主导的电子参与的研究经常陷入鼓励公民参与和保持政府控制的两难之中，一方面公民似乎并不总是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如有的电子平台无人问津），另一方面有些政府部门害怕过分的参与会导致极端言论而对一些电子平台实施严格控制，或者一些政府部门并没有积极对待电子平台上的参与。这样的困境与更深层次的政治结构、权力关系有关，因此新科技本身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困境。

政党是另一类非常重要的政治主体，政治家在很多国家都必须和政党相结合，本章的回顾因此将这两个主体合并讨论。政党支持的选举候选人如何在大选期间利用互联网等新科技进行助选，这

几乎是美国传统影响下的互联网政治研究的最重大课题。从实践来看，美国最近几届总统候选人对于互联网的娴熟运用，显示了新科技在大选中扮演的重大角色。比如说，奥巴马的新科技团队成功地利用社交媒体组织他的支持者在网下为他助选，奥巴马在视频网站上的短片也成功地吸引了年轻选民的注意，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打击了形象相对不那么年轻的对手。有关如何策略化地使用互联网来进行助选的书籍风靡一时（如 Hendriks 和 Denton, 2010）。与此相对应的，互联网在非西方的民主大选中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举例来说，马来西亚的最近两次大选都显示了两个对立政党积极使用互联网来争取选民，一些博客作者最终当选为民意代表。学术研究对选举技巧和策略的兴趣是有限的，研究更关注的是有普适性的结论或者理论（如 Parmelle 和 Bichard, 2012）。其中一种就是利用统计方法来比较使用和没有使用互联网的候选人的得票情况，另一种是用社交媒体上的支持率来预测当选概率（Skoric, et al., 2012）。不少研究发现，新进的挑战者或者在野党的候选人倾向于积极使用网络来为自己造势，但最终得票情况还要考量其他因素。在某些国家，社会媒体的支持率几乎与最终选举结果一致，但在另外一些社交媒体不太普及、城乡差距大的国家，这种一致性尚未得到支持。

互联网提供的低价有效的传播渠道使得政党可以在选举期之外保留它们的网站和社会媒体，在选举之后继续影响选民，这一事实进而促生了一个名词“永久的助选”（permanent campaign）。至少在有选举的国家，这一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根据 Nixon, Ward, 和 Gibson（2003）的总结，早期的政党网站更多起到的是一种符号作用，表明这个政党是开明创新的。后来政党网站被整合到主流政党传播中来，辅助传统的传播渠道如党刊等起到了与党内支持者交流的作用。可是政党总体来说对新科技的使用还是相当谨慎与保守的，很多时候还是依赖已有的党内结构来行事，对从下而上的党员参与进行管理和疏导。这样的发现可能不太适用于政党政治没有那么定型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新科技的大胆使用是这些国家的反对党的特色，尤其因为这些国家的主流媒体为执政党所严格控制，马来西亚就是一例。但是最近的 2013 年大选，马来西亚执政党奋起直追，似乎在运用新科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并取得相当成效。因此笔者建议在考察政党政治在互联网上的表达时，还是需要回到已有的主要政党之间的权力平衡来看。

一些学者（如 Bimber, 2003）认为，运用互联网最具创造力的政治主体是一些非政党的政治或者民间组织，美国的 moveon.org 就是一个典型。这些民间组织的崛起体现了一个从政党政治向议题政治转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公民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定期选举民意代表，而是希望能够在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上有发言权和影响力。这些民间组织常常以某些议题为中心，组织并动员公民们的积极参与，从网上募款到电子请愿到制作病毒性传播的网络短片等形式不一、风格不拘。Karpf（2012）在他的著作中详细描绘了美国的利益团体政治如何因为这些围绕互联网科技而建立起来的民间政治团体产生了预料之外的转变。他论述了新科技的重要性，但也同时提醒读者，这些新型组织还是具备组织的架构，和一些分析家认为的完全自发的集体行为还有一些差距。他还指出，这些民间政治组织虽然有很多支持者，但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现状，即党派分野仍然是这些组织的基础，超越政党的商议民主在这类组织中并不常见。

新闻媒体一度被誉为“第四权力”，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互联网也被称为新媒体，强调了网络作为新闻载体的属性。已有的新闻媒体纷纷推出网络版以应对网络上快速大量传播的免费信息。随着纪录与传播科技的普及，由普通民众进行报道的公民新闻开始崛起。传统新闻业受到的

挑战以及公民记者的涌现，成为了研究新闻媒体与互联网政治的两个关注点。当互联网被看作是与电视、报纸类似的新闻媒体时，很多传统政治传播理论和研究范式都可以被应用到研究互联网上来。比如说，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就可以被用来研究网上的议程设置过程，看看网民对议题重要性的判断是遵循网上议程还是网下议程，或者看看网络议程是跟随传统媒体议程还是相反。这种简单地应用经典传播理论的研究忽略了网络独特的媒体属性，无法深入考察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本质区别。Tewksbury 和 Rittenberg（2012）的著作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互联网新闻的不同之处，首先用户们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积极主动的选择者；其次网上信息极大丰富，各类专门性的新闻服务层出不穷，导致了新闻受众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散；再次由于人类有选择自己喜爱的内容的倾向，网上新闻的丰富性鼓励了用户只看与自身已有喜好相一致的信息，而当用户们的已有喜好一而再地被加强时，他们的观点可能变得更偏激，而在总体上导致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网上新闻的使用和消费常常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网上新闻的制作与传播就需要从组织传播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了。例如 Boczkowski（2005）的著作就考察了传统报纸媒体（如纽约时报）以何种策略将互联网纳入每日新闻制作的流水作业之中的。最令新闻研究人员兴奋的是互联网以及电子摄录设备的小型化傻瓜化促进了公民记者的诞生和普及。公民记者与职业记者不同，他们不受传统媒体体制的约束、没有经过职业化的训练、也不涉及职业记者圈的利益关系和文化，这使得他们的报道迅速快捷在场感强烈但是缺乏职业素养（如全面客观经过核实）。除了探讨公民记者的优劣之外，一些研究也关注传统职业新闻媒体如何与公民记者相互配合取长补短。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涌现，人们获得新闻消费新闻的方式将大大改变（如微博成为新闻的一个重要传播渠道），我们期待能有更多对新兴新闻载体的研究。

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不仅仅是为了传播新闻而存在，对于很多政治主体来说，它更像一个平台或者一类空间，使得这些政治主体能在其中有所作为。行文至此，笔者将着重讨论政治积极分子和普罗公众是如何在网络空间中积极动员、自我组织、实现影响的，这类研究常常被称为网络积极行动（cyberactivism）或者电子积极行动（digital activism），是互联网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理论来看，这个分支受到了政治社会学的很大影响，常见的理论包括社会运动、社会网络、新社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及其批判衍生的附属另类公共领域（subaltern public sphere）理论（Zhang, 2006; 2012）。从具体研究来看，这个分支倾向于关注某一个或者一类网上空间，深入探讨一些有政治诉求的网民们是如何聚集起来、建立网上社群、发展社群间的合作、最终向更广阔公众发出诉求的。举例来说，McCaughey 和 Ayers（2003）编撰的书籍中收录了一些这类案例，有的案例与前面提到的民间组织紧密结合，有的则更倾向于草根生长出来的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尤其是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同性恋、少数民族、移民等。这个分支在中国情境下的发展最为蓬勃，可能是因为上述的一些政党与选举政治等并不适用于中国，而中国网民的积极行动却屡见不鲜。Yang（2010）的著作就是一个典范，这本书详细探讨了多个网民以及民间组织运用互联网推进政治诉求的案例，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发展是并行的。如果网络是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石之一，我们的研究就应该更多地考察新科技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运行中的角色与作用（如 Zhang & Wang, 2010），尤其是与西方在工业化和大众传播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大胆抛弃一些基于西方历史实际而产生的关于政治传播的假设，例如“只有选举政治才是民主”，仔细观察中国事实并小心分析一些看似普通的每日生活（如 Zhang & Mao, 2013）的政治含义。

互联网政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有关普罗公众在网上的政治讨论。这些讨论有的是自发形成的，有的是民间组织或者政府部门领头的，指导这类研究的理论是受到公共领域概念激发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关于政治讨论的研究由来已久，经典的两步传播理论就曾指出大众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必须经过人际传播这一个中间程序，公众之间的讨论可以改写大众媒体的效果。随着政治讨论研究的演进，政治异议（**political disagreement**）这个概念出现了，这类研究指出政治讨论对讨论者的影响还要取决于讨论中有多少异议出现。一方面，政治异议体现了政治讨论的多样化，不同的信息和观点被带入讨论，有启发民智的优点；另一方面，政治异议可能带来负面的情绪影响，因此当讨论者意识到对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时候，可能会转开话题或者可以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并进一步地阻碍这些讨论者采取政治行动。互联网所具备的人际交流功能（如论坛、即时聊天工具、社交网站）提供了政治讨论的土壤，网络用户的多样性也在理论上提供了人们与不同人交流的可能性。一些民间组织就企图利用互联网的特性来组织公民们进行政治讨论，希望由此教育公民，让他们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顾全大局。研究人员也加入到这一热潮中来，比如说，宾西法尼亚大学 **Vincent Price** 教授所领导的一系列网上商议（**online deliberation**）项目，创造性地使用聊天室工具来组织来自全美的参与者在网上讨论总统大选、健康改革等重大议题。政治讨论里的重要概念如异议也在网上商议研究中得到强调，**Stromer-Galley (2003)** 的研究发现网民们想要知道和他们不同的人是怎样想的，但是 **Wojcieszak 和 Mutz (2009)** 的研究发现这些与不同的人之间的讨论倾向于在非政治性的讨论空间发生。笔者的博士论文专门探讨网上商议所面临的不平等挑战，如何让那些在网下已经落后了的公民不被网上商议这个体制进一步边缘化，这将是网上商议研究和实践需共同解决的难题（**Zhang, 2010**）。

展望未来

本章着重讨论了互联网科技对政治传播以及政治传播研究所带来的重大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无法详细论述其他新科技如移动电讯和电子游戏对政治传播的影响。比如说，移动电话的普及率已经超过电脑，成功地进入了相对不发达地区和相对低收入人群，移动电话对电子鸿沟的改善因此成为了一个重要研究问题。一个名为“信息传播科技与发展（**ICTD**）”的研究领域特别关注新科技如何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边远地区的发展，可惜这个领域在传播学中还是边缘。电子游戏的研究更加处于早期，但是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如何促进社会变革。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移动科技和电子游戏的进一步普及，关于它们的研究也会有更长足的进步。

新科技与政治传播这一领域虽然还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期，但是一些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足仍然存在。笔者将从理论、适用范围、方法这三个点来讨论不足和改善之道。首先从理论来说，如上所述，大多数的研究还是企图将已有的传播理论延伸到新科技的研究中来，因此媒介效果研究和民意研究里常用的一些理论还是经常见诸新科技的研究当中。并不是说这些理论完全不当被用于新科技的研究，而是说这些理论的产生自有其历史背景和条件，而这些历史背景和条件与当前的状况不甚符合。比如说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在一个大众传播中期的历史背景里产生的，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电视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成型期，只有几种全国性的报纸和电视台能对全国范围内的受众产生影响，因此一个相对统一的议程设置过程是可能的。可是新

科技所带来的信息的极大丰富以及用户的积极选择，都使得一个相对统一的议程设置过程变得不再可能，这个理论的适用性因此大大减低。另一方面，也并不是说所有传统理论都不适用于当下，比如说社会网络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惜由于社会网络理论是一个社会学的理论，传播学对这个理论的借鉴和运用还处于比较青涩的阶段。对于传统理论的依赖阻碍了我们对适用于新科技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各种新理论百花齐放的状态并没有在这一轮新科技发展中涌现出来，尤其是对于新科技的本质有深刻体察的理论还没有涌现出来。笔者建议，当我们为新科技与政治传播创建新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将新科技的特性放进理论中来，也就是说，新科技的属性如互动性、移动性、记录功能等必须成为理论的基础，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新理论和传统理论相比是有本质上的飞跃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传播学者必须发挥传播学交叉学科的传统，努力向其他相关学科学习新范式，电脑科学和信息科学就是两个很好的老师。

其次是研究的适用范围问题，由于欧美在传播学中的历史优势，不难理解欧美传播研究的主流地位，也不难理解为何欧美以外地区的传播学研究长期处于一种邯郸学步的状态。一种是研究者们将欧美理论和研究范式原封不动或者稍加修改后搬入其他国家，另一种是研究者们完全否定欧美传统而强调本国的独一无二性。笔者看来两种都是对欧美中心主义的一种复制，前者是为已经被证明了的欧美理论寻找新的证据，后者仍然是一种中心主义的表达，只是将欧美换作另外的国家罢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提高理论和研究范式的适用范围，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只是望向欧美，我们对自身情境的思考也不能只是以欧美作为标尺来比较，而是扩展视野望向其他类似国家。举例来说，一个新科技普及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用欧美国家来做参照物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国家如果想发展自己的新科技，必须从普及率相仿或者略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学习。与此类似的是我们的政治传播研究，一个非民主国家和欧美民主国家的比较只会达致你有我无的结论，但是和其他类似政治体制国家的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些政治因素的不同可以导致政治发展的不同。笔者在这里呼吁传播学者以平常心看待欧美，不谄媚不贬低，认真仔细地考察欧美传统的精髓。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促进地区间对话以及地区内的国家对话（如 Zhang & Chib, in press），以同样的积极态度来学习欧美以外国家的研究成果。

最后是研究方法问题，新科技为我们的研究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都是巨大的。一方面电子科技的纪录功能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以前不可想象的数据来源，数以亿计的用户数据、以秒为单位极速增长的用户创造内容，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已经来临。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只懂得处理相对较小的数据库，对这种大型数据的分析还有些不知就里。比如说，大数据的代表性问题，虽然大数据很大，但还不是全部人口，大数据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全部人口几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种困难主要源自于抽样过程的不可控性，因此无法推测抽样的误差率。再比如说，如何处理分析规模庞大的用户创造内容，人工的归类几乎不可能，机器分析又很难深入，如何平衡数量与质量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难题。可是传播学者必须认识到，研究方法的革命不可避免。传统的问卷调查、内容分析等量化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的分析要求，新的方法和工具的产生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和学习研究方法。

小结一下，本章的回顾划定了政治传播与新科技的版图，展现了政治传播的传统是如何延伸到有关新科技的研究中的。尽管新科技千变万化，以政治主体为坐标的版图有助于我们去思考政治传

播受到新科技的影响。除此之外，尽管困难重重，新科技和政治传播研究还是大有作为的。从理论到方法到研究范围，还有很大的空间等待传播学者们去开拓。

文献

Bimber, B. (2003). *Inform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echnology in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czkowski, P. J. (2005). *Digitizing the news: Innovation in online newspap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leman, S. & Blumler, J. (2009). *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hlberg, L. (2011). Re-constructing digital democracy: An outline of four “positions”. *New Media & Society*, 13(6), 855-872.

Donsbach, W. & Traugott, M. W. (2010). Introduction. In W. Donsbach & M. W. Traugot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pp.1-7. London: Sage.

Hendriks, J. A. & Denton, R. E. (2010). *Communicator-in-chief: How Barack Obama used new media technology to win the White House*. Plymouth, UK: Lexington Books.

Hinderman, M. (2009). *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rpf, D. (2012). *The MoveOn effect: The unexpected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advoc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vin, C. (1988).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Kinnon, R. (2012). *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global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Basic Books.
- McCaughey, M. & Ayers, M. D. (2003).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cLeod, J. M., Kosicki, G. M., & McLeod, D. M. (1994). *The expanding boundari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In J. Bryant & Zillmann, D.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p.123-162.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McLeod, D. M., Kosicki, G. M., & McLeod, J. M. (2009).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In J. Bryant & M. B. Oliver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p.228-25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cNair, B.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Negrine, R. & Stanyer, J. (2007).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Nixon, P., Ward, S., & Gibson, R. (2003). *Conclusions: The net change*. In R. Gibson, P. Nixon, & S. Ward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Internet: Net g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OECD. (2003). *Promise and problems of e-democracy: Challenges of online citizen engagement*. Paris, France: OECD Publications Service.

- Parmelle, J. H. & Bichard, S. L. (2012). *Politics and the Twitter revolution: How tweets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 Public*.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Putnam, R. D.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8, 664–683.
- Qiu, J. L. (2007). The wireless leash: Mobile messaging service as a means of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74–91.
- Reddick, C. G. (2010). *Comparative e-government*. New York: Springer.
- Rogers, E. M. & Malhotra, S. (2000). *Computers as communication: The rise of digital democracy*. In K. L. Hacker & van Dijk, J (Eds.), *Digital democracy: Issu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0-29. London: Sage.
- Skoric, M. et al., (2012). *Tweets and votes: A study of the 2011 Singapore General El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12 45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 (HICSS), pp.2583-2591.
- Stromer-Galley, J. (2003). Diversity of political conversation on the Internet: Users'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8(3).
- Tewskbury, D. & Rittenberg, J. (2012) *News on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ui, L. (2001). *Big Mama is Watching You: Internet Control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Leiden, 2001. Unpublished MA Thes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lokman.nu/thesis>

- van Dijk, J. (2000). *Models of democracy and concepts of communication*. In Hacker K. L. & van Dijk, J. (Eds.), *Digital democracy: Issu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Verba, S., Nie, N. H., & Kim, J.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Chicago, US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erba, S., Schlozman, K. L., & Brady, H. E.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oltmer, K. (2006).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new democrac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Wellman, B. (2011). *Studying the Internet through the ages*. In Consalvo, M. & Ess, C. (Eds.), *The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 Wojcieszak, M. & Mutz, D. (2009).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Do Online Discussion Spaces Facilitate Exposure to Political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9(1), 40-56.
- Yang, G. (2010).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W. (2006). Constructing and disseminating subaltern public discourses in China. *Javnost-The Public*, 13(2), 41-64.
- Zhang, W. (2010). Technical capital and participatory inequality in eDeliberation: An actor-network analysi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3(7), 1019-1039.

Zhang, W. (2012). Virtual communities as subaltern public spheres: A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an application to the Chinese Internet. In Li, H. (Ed.), *Virtu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motivation: Cross-disciplinary theories*. Pp.143-161. Hershey, PA: IGI Global.

Zhang, W & Chib, A. (in press). Internet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discourses: The cases of China and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Zhang, W. & Mao, C. (2013). Fan activism sustained and challenge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Chinese online translation communit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45-61.

Zhang, W., & Wang, R. (2010). Interest-oriented versus relationship-oriented social network sites in China. *First Monday*, 15(8), Accessed on July 30, 2010 at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836/2582>